

张政烺先生学行录

前 言

大学校园政治气氛浓烈的年代，我走进燕园，在热烈的嘈杂声中熟习校园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第一位教我们专业课的老师登上讲台，他就是历史系著名教授张政烺先生。先生是一位身材魁伟、端庄面善的中年人，讲课胶东口音浓重，典型的山东大汉式学者，那一代知识分子中山东出了不少学者和教授，先生名列前茅。1912年先生生于山东荣成，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同年以优异成绩入选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人员。1946年之后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以后又兼任或专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长达60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始终坚持一个正直学者的学风，不赶浪潮，不迷信权威，以史实为依据，直接或间接研究中国古代史和传统文化，尽最大努力恢复历史本来面貌和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这些都是我到历史研究所之后才逐渐领悟到的。

先生一生以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为己任，扶持学生走上学术之路是他的乐趣，故同先生往来经常谈学术主要是：商周历史、考古、古文字、汉简到碑刻和版本目录等，有时为了让听者能更理解要点，还找出书来举例说明某个问题，加深印象；或谈些学术界的遗闻佚事，激发听者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引导学生在学术道路上奋斗的决心。交谈过程中深知先生不仅对中国古代史的重要问题有深刻的思考，而且对近现代史也有自己的看法，对当代著名学者的经历也了如指掌。对于先生这样渊博的知识，我们只有怀着“高山仰止”的心情努力奔跑了。记得先生同我走在上班的路上，谈到研究古代史时，我问先生甲骨文中“众”或“众人”是奴隶吗？先生说谁说的，摆出材料来嘛。又说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后，人们想方设法证明它的正确性，对他种观点则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先生本来是以

研究中国古代史著称的学者，他却转向研究古文字，时代使然。这就更迫使先生从基础资料的研究入手，先生自谦“不是甲骨学家”，但他对甲骨资料非常熟悉，写出一系列有创见的有关商代社会生产的论文，又根据金文和刑徒砖的资料写出秦汉刑徒是奴隶的著名文章，等等。这种通过古代实物文字资料写出的论文，充分体现了一个时期先生研究历史的特点。有人说先生研究历史只注意一个个具体问题的考证，不能驾驭历史的全貌。其实先生的考证，一是可以恢复真实的历史面貌及其深刻的社会发展内含，二是那个年代既可以做又不会引起争议的最好选择，至今这些学术智慧的结晶仍是学者称颂的话题。

古文字考释是先生治学的又一重点，因为它与研究古代史有密切关系，把研究古文字视为建设典籍匮乏的商周历史的重要手段（当然也包括考古新成果），因此学术界又尊称他是古文字学家。他对甲骨文和金文的考证力求形、音、义统一，从青年时代的《猎碣考释初稿》、《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到《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等，都贯穿这一原则，考证出的文字解释得形、音、义圆通无可争议。正因为如此，才把一些难解文义的甲骨文、金文转化为可以利用的基础史料，用以探讨商周历史和早期文化史，这方面贡献的突出事例是掀起世界范围内研究《周易》的热潮。

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还是古典小说专家和版本目录学家，最让学术界敬佩的是胡适难以作答的《封神演义》作者问题，还在求学的先生只用了很短时间就给出了答案，胡适承认其结论。而相传“宋岳珂撰”《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及其所刻《九经三传》，经先生考订实为元代岳浚所刻，其结论已得版本学家所采纳。还有许多历史、考古、古文字、古典小说的难解之谜被先生破解，相关学术领域的专家都给与了公正的评价。

横跨多个学科学术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展示先生的文化底蕴深厚，是众所周知的，丰富多彩的业余爱好知道的就不多了，更显示出他多才多艺的人生，诸如书法、篆刻、摄影等方面的作品也是技艺超群的。闲暇还喜欢看京戏和昆曲。自幼喜好书法，行书、楷书、篆书、甲骨文、金文等，都有作品流传于北方诸省市，如早年给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的篆书条幅（见《张政烺文史论集》），由苏秉琦教授撰文先生为山西省考古研究

所题写篆书《晋文化颂》，给张守中书写的甲骨文对联，给邓林秀书写的行书七言诗斗方等。先生深得书法精髓，他为北大某教授题词主张“书以气为主”就是他对书法理论的概括，充分体现他对书法造诣的高深（原刊《北京大学当代学者墨迹选》，1992年）。从书法墨迹观察，先生的书法风格是学者型的书法家，每副字都饱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篆刻，也是先生审视古玺印自创的风格，先生书写的各种条幅、斗方和扇面等所钤印章，就是其代表作品。先生会摄影尽人皆知，尤其是文物摄影，他对实物的摆放、衬底、光线照明都非常内行，他主编《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时亲自或率领文物摄影人员拍摄文物表现尤为突出，随行人员无不钦佩。有一个故事也说明先生的摄影技能高超，在北大历史系遭排挤时，先生曾说没有地方去，可以开照相馆挣饭吃。但先生对照相机性能的了解知之者较少，他对德国、日本高、中、低档相机的种类如数家珍，就连日本的最新产品尼康相机的各种型号和用途都一一知晓，故有“奇才老者”的美誉。

先生一生醉心于学术研究，学界遇到难解之题，往往寄希望于先生，先生确实为学界和后辈解决了不少学术上的难题，国内外学者无不交口称赞。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尊敬的师长，是学术界一大损失。在敬仰先生的为人为学榜样的同时，要继承和发扬他的治学精神。

张永山 2009年元月于太阳宫寓所

目 录

前 言	1
学问与人生	
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张政烺老师	宁 可 3
师恩难忘	
——回忆张政烺师三事	胡殊生 5
张政烺先生教学和育人	周清澍 9
治学导师 做人楷模	
——忆张苑峰先生	高 明 19
淡泊名利 平易近人	
——缅怀张苑峰先生	卢兆荫 23
纪念好老师张政烺先生	萧良琮 28
缅怀可敬的张政烺先生	郑振香 41
一瞥劫后灿烂（节录）	
——记校点“二十四史”时的张政烺	黄 克 49
怀念与自责	
——想起张苑峰师与我的一些事	何龄修 51
怀念业师张政烺先生	杨大业 57
苑峰师杂忆	陈智超 59
我所认识的张政烺师	王曾瑜 64
张政烺先生调离北大的前前后后	王恩田 71
难忘的教诲	
——忆张政烺先生	刘一曼 76

记忆中的一串珍珠

——怀念张政烺先生 罗 琨 85

传道、授业、解惑

——忆张政烺师 张永山 90

点点滴滴忆恩师 吕宗力 97

张政烺先生在解破数字卦中的贡献及

给我们的启示 刘宗汉 周双林 101

张政烺先生的读易笔记和参考书 李 零 108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校读》整理说明 李 零 116

我的导师张政烺 孙言诚 120

张政烺先生对古文字研究的贡献

——兼忆先生二三事 刘 桓 135

真诚求实是为人为学之本

——我认识的张政烺先生 张永山 147

张政烺先生学术传记（部分） 王曾瑜 158

奇才老者

——张政烺先生 梁子明 192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文物图集》前期工作的回忆 安守仁 197

学习与思考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史学篇） 吴荣曾 211

博大精深 正风楷模 王曾瑜 214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明清史论著 何龄修 220

中国考古学寻根

——读张政烺先生《中国考古学史讲义》 罗 琨 224

赶紧读书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 李 零 230

化繁为简 攻克难点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简帛篇） 张永山 236

厚积薄发，开风气之先

——读张政烺先生的石刻论著 赵 超 242

张政烺先生与古文字学	裘锡圭	248
《六书古义》读后	萧良琮	253
《猎碣考释初稿》读后	徐宝贵	257
张政烺先生对甲骨学的贡献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中有关甲骨学的论文	刘一曼	261
张政烺先生的金文研究	刘 源	267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随感		
——略谈张先生对中国小说史的独特贡献	程毅中	273
读《张政烺文史论集》中有关《封神演义》的论述志感 ...	白化文	276
浅谈张政烺先生的版本目录学研究	汪桂海	279
张政烺先生《中国历史图谱资料目录（草稿）·封建社会 部分》批注蠡测	刘宗汉	287

学问与人生

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张政烺老师

宁 可

今年是北大建校 110 周年，在不计其数的北大人中，我曾经有过在北大两整年的读书经历。在校时，正值北大庆祝建校 50 周年。60 年过去，我已是垂垂老矣，但在那不比一张纸厚的两年岁月里，当时经历的北大的人和事，仍旧清晰如绘，历历在目。这里就回忆一下当年受业时的四位老师。

张政烺先生

1947 年秋天，我从北大先修班升入史学系一年级。虽然学了一年，但从先修班升入本科，一切还是透着新鲜。这时，原定一年的中国通史课，改为两年，第一学期是上古——先秦史，张政烺先生讲授。这是第一次上本系专业课，第一次见到史学系的老师，也是第一次见到张先生。

张先生体态魁梧，头比一般人大一些，圆脸上一双大眼睛，弯曲的浓眉，令人不禁想起商代青铜器鸱尊。再加上一副圆框眼镜，整个面貌就像一圈圈大大小小的圆，然而神态却是恬然和藹的。张先生常着一袭蓝布长衫，上课有点腼腆，从不正面对人，只是侧着身子面向黑板，用粉笔写很多很小的字，好像有点愧对黑板、课堂和学生的样子。张先生上课操一口胶东腔，声音很小，是当时史学系教课嗓音最小的三位教授之一（另两位是向达先生和邵循正先生）。张先生讲课速度比较快，似乎有点急于把自己的话传授给学生，因此显得缺乏系统，杂乱无章，东一句西一句，不时出些支岔，从这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好像身上装了一个话盒子，新鲜话题不断在里边躁动，随时会顶开盒盖，跳出一两件来。他对此似乎也无法控制，却又拙于表达，往往挣得满面通红，额头冒汗，面带愧色，连连

说：“这个问题，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同学开始对他这种讲法不甚满意，也抱有一丝同情和几分谅解。历时稍久，特别是到课下整理乱糟糟的笔记和他随口提到的专书论文时，就慨叹他讲课内容的丰富和涉及知识的广博。那里不仅有学科前沿的种种新成就，也有独到的精辟而又新颖的见解。他那老说“讲不清楚”的地方，正好是史学界争议之所在，也许就是他没有搞清楚，或者还有待去研究，难于遽下断言的地方。

听张先生的课不久，就听到高班同学讲，北大史学系1936年毕业的那一届，出了“四大金刚”。云为“金刚”，喻其实力雄厚，张政烺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位是邓广铭、傅乐焕、王崇武），好像还是最年轻的一位。我跟着张先生听课，记笔记，整理笔记，寻找他提到的专书和论文，慢慢地就知道了安特生和仰韶文化，吴金鼎和龙山文化；也知道考古发掘发现有一处黑陶文化层压在彩陶文化层之上，说明二者时间的先后次序（以后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还知道傅斯年在《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上发表的《夷夏东西说》，蒙文通《古史甄微》中的河洛、海岱、江汉三民族说；我还从张先生那里知道了甲骨文先是用笔写在龟甲兽骨上，然后再由刀刻上去的，那枝发掘出来的最古老的空心毛笔管照片就赫然登在中央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抗战前出的《考古学报》上。

张先生的课照例是前松后紧，上古——先秦史还没有讲到春秋，就放寒假了。听了一个学期张先生杂乱无序东拉西扯的课，跟着读了一些相关的书、文，谈不到对这段历史有什么系统清楚的了解，却培养了我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似乎也领略到了一点治史的门径。

编者摘自《回忆在北大受业时的四位老师》，原刊《光明日报》2008年5月4日第7版“史学”

师恩难忘

——回忆张政烺师三事

胡珠生

—

1948年秋，我考取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心情非常高兴，在温州一家书店买来三本《当代中国学术丛书》：《当代中国哲学》（贺麟著）、《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著）、《当代中国政治学》（杨幼炯著），当即一一细读。《当代中国史学》对近百年中国史学的研究情况作了极其详尽而精辟的论述，并在每一专题下列举著名学者及其代表作。该书下编第四章第一节小说史的研究提到：

张政烺先生学问极为广博，即在小说史研究上亦有很高的成就。如所发表的《〈封神演义〉的作者》（《独立评论》209号）、《讲史与咏史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其见解均精确不易。

进入北大后，中国古代史一课正由张师讲授，出于内心的崇敬，我听课非常认真，尽管有些山东口音听不清楚，下课后仍从同乡李作仁同学处借来笔记核对，至今保存的讲课记录，正文40页，附表4份，言简意赅，实为高水平的学习中国古代史的入门要籍。其导言认为“传统史家研究历史的对象不外乎：1. 年代（活动的时间）、2. 地理（活动的空间）、3. 人物（活动的脚色）、4. 制度（活动的表现）”。因此第一篇就是年代，共分十一节，依次为西历公元元年——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廿六年；公元前403—前221年：战国

时代；公元前 722—前 481 年：春秋时代；公元前 841 年——共和元年；公元前 1122 年——纣亡之年；公元前 1133 年——周武王十一年为伐商之年（此说未经确定）；公元前 1395 年——盘庚迁商于殷之年；公元前 1851 年——为商有国之年；公元前 2322 年——禹有国之年。替后来的夏商周工程奠定可靠的基础。第二篇是古代史，分三皇、五帝、夏、商、周五章。第三章下分夏之怀疑、夏之世系、夏之社会、禹、禹之治水、禹分天下为九州、禹治洪水之怀疑、相传禹治水的地域、禹治洪水的探究、夏之都邑、夷夏之别、夷之族姓、启益争统等十三节。第四章下分商之兴起、商之世系、商之都城、盘庚迁殷、殷墟发掘、商代社会、纣伐东夷、商纣之亡国等节。第五章下分周之兴起、殷商关系、周与鬼方、文王事绩、武王克殷、周公事迹、周初之东向发展、周之中衰与东迁、宗法与封建、春秋的霸政等节。殷墟发掘节阐明“首考‘殷墟’二字为晋束皙”，阐明“宋有吕大临者撰《考古图》详述”殷墟“此批古物，而宋之法帖可见该项铜器之铭文。”阐明甲骨文学从王懿荣、孙诒让、罗振玉到王国维、郭沫若和殷墟发掘报告的学术成就，“今日为止，出土之甲骨文仅十万片以下，正式发掘者达二万五千片（最大的达 1 尺 8 寸），颇可供断代之研究。”阐明“殷墟所获青铜（铜加锡合金），为我国最早之铜器时代。”司母戊鼎“重达 1200 余斤，可见当时炼铜技术已很高明。”“从鼎铸范模、化炉之陆续发现，证明铜器非从外国买来。”讲稿引录古籍多达数十种，用春秋时《齐侯钟铭》（编按：即叔夷钟）：“成汤忧天命伐夏后”、“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证明当时确有商灭夏和禹治洪水的传说，用甲骨文中六种不同的“田”字，证明“田”为标准字，“可知古时地广人稀，每人皆可取其肥土而种之，而得行井田之制。”实事求是，令人信服。解放以后不久，北大历史系办全国考古训练班时，烺师除中国通史外，还开金石学、古器物学、考古学史等五门课，显然是在中国古代史讲稿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二

1949 年 1 月，解放战争处于决战时刻，同学们无法回乡度假，大都留校，我当时受四院学生会之托，前往烺师家，恳求举办一次学术讲座。2

月5日焯师投邮发给我一函：

珠生同学：

别后，因为患流行性感冒，头痛咳嗽，所以老没给您信，很抱歉。关于学术演讲的题目我想了一个是：关于“说话”。这是一个中国小说史上的问题，听说要有中文系的同学听讲，所以我决定了这个题目。关于这个问题，十年来我很费心研究过一翻，不过题目太大了，一时不容易说得清楚。现在各图书馆都不出借书，也增添许多困难。

现在这个时代太伟大了，有许多应当知道、应当学习的事情都摆在我们眼前，我想不会有人高兴听这样陈旧沉闷的东西。所以，如果同学们同意，将这次演讲取消也好。如不取消，时间即定在本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时，请来一电话！（5.1825）

问好。

弟张政焯上

由于军事形势的急遽变化，解放军已进抵北平城外，学生会发动同学护校，这次演讲也就未能举办。

这封用蓝墨水写的信函，一直珍藏至今，每一展卷，仿佛看到恩师的音容笑貌和严肃的治学风范。

三

1952年下半年，我从事清代秘密结社史的探讨，曾从历朝《东华录》、清史奏疏、刑案汇编、碑传集等着手搜集资料，发现会党本身文献的重要性，便写信给焯师求助。10月初焯师寄给我萧一山辑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和王约瑟编的《渡世宝筏》，10月10日收到后，喜出望外，立即捧读并择要抄录。前者为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社会史料丛编第一种，收录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和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天地会会簿多种，是探讨洪门会党史的必读书籍。后者为青帮内部秘籍，石印本，长4.8吋，阔3.55吋，蓝布面，原为青帮姬子明私物，共18章257页，有民国廿一年九月二

十日合肥黄 序。姬子明道号悟光，祖居山东汶上县，移居太和，传道三代师太为王约瑟（原名世麒，道号大同）。姬于民国廿九年九月廿四日小香，民国三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大香，可见得藏《度世宝筏》并非易事。该书第一章为佛祖降世暨历代禅祖传法根源，第二章为吾道祖师宗法续传，第三章为立帮传道原始，第五章为世代班辈前后字派，第六章为祖训帮规禁止要件，第八章为翁钱潘祖堂物考，第十章为帮头名称暨漕船数目，第十四章为安清进门说，第十六章为大香堂款式。是阐述青帮家底和入帮仪注的罕见要籍。从此，我对会党史的研究逐步深入，终于1979年在《历史学》季刊第三期发表了《青帮史初探》，第四期发表了《天地会起源初探》，并在《青帮史初探》文后加“作者附注”：“本文写成，得力于张政烺师、袁定中同志及已故梅冷生翁等的支持。敬此致谢，以示不忘。”1980年7月初，我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参加清史副研究员论文答辩考试时，曾专程前往永安南里寓所拜谒恩师，适值外出，不遇而归，未能当面声谢，至今犹耿耿焉！

张政烺先生教学和育人

周清澍

今年春天，我偶然从网上惊悉，苑峰师于2005年1月29日逝世，当时我正侨居美国女儿家中，无法亲临追悼，深感遗憾。苑峰师是我初入大学时第一个专业课老师。我虽然没学到他的专业特长，但回想起来，在治学、从教和做人等各个方面，他却是对我潜移默化、影响最大的师长，也是我心目中最敬爱的老师。

1950年我刚入北大史学系，大一共5门课17学分，中国通史是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分4段4学期讲授，开头第1段就是苑峰师讲授的先秦史。我入学时听人介绍，北大史学系最重视基础课，尤以中国通史是本系的强项，每段都是由所授断代的专家讲授。各大学教师中，对先秦有精深研究的史学家不多，苑峰师虽年未四十，学识较年长的老专家也未必多让。他不仅精熟文献史料，也熟悉考古资料，能给高年级开古文字学和古器物学两门课，像他这样文献和考古兼精的学者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张先生口才欠佳，满嘴山东口音。他的知识渊博也成为缺点，常讲到高兴时，会将自己感兴趣的事不断讲下去，忽然发现扯远了，于是就会用胶东话说：“我讲到哪儿啦？收不回来了。”我们就会心地笑起来。他生活上很不讲究，常闹笑话。我们的教室在沙滩较新的北楼，冬天暖气很热，他穿的皮袍不便脱下来，只好解开领口、上襟的纽扣，仍热得满头大汗，用胶东话连说：“这个屋子太热，热得不知怎么办了！”手忙脚乱，黑板刷也找不到，就用衣袖擦黑板，不止手上沾了粉笔灰，进门前还干净的长袍也一塌糊涂。我们刚从中学出来，习惯于历史老师讲故事式的教学方式，而张先生的课，除了引用深涩的古文外，又佐以大量枯燥的考古资料，阐述从政治到经济、社会制度，一般文化到物质文明的历史。这么丰富的内容，中学生从未见识，也不易接受消化。他的记忆力极强，连每次考古发

现有什么都能如数家珍，我还记得他令人发笑的念叨：“戈呀！矛呀！石器呀！玉器呀！……”，这些都成为我们课余学舌寻开心的资料。同学们听他的课比较费劲，笔记记不下来，许多人抱怨他讲得不好，但这唯一的专业课仍必须郑重对待，下课后只好找记得全的同学重新整理。我也是须课后整理、补记笔记的一个，但整理几次之后，发现完整的记录条分缕析，论证问题逻辑严密、深刻有力，而且提供了通行著作中所没有的知识。在大学四年中，有些同学认为邵心恒（循正）师和他的口才最差、讲课效果不好。而据我的体会，却认为他俩的课挖掘问题最深，对我的启发最大，至今仍留下深刻的印象。近年周一良先生著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认为这两位先生“脑筋敏锐、善于深思”，是他“特感敬佩”的同事。周先生与苑峰师初出大学时曾在史语所共事，回忆有次学术讨论中，甚至所长傅斯年也要向他征询意见，说：“你是最 critical 的，你对这问题怎么看？”（《郊叟曝言》P. 90《史语所一年》）

苑峰师的课不指定参考书，我们在辅导课时曾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只让我们读《资治通鉴》，由于《资治通鉴》从战国开始，战国前就让我们参考《史记》。如只愿看今人著作，他说：“那就看《中国通史简编》吧”！还说：“郭沫若的文章好懂，他的几部古代史著作也可以看”。其余的书，他一律不赞成我们参考，有几部还直接指出其中错误，评价极低。思想改造和一系列运动后，他和别的老师再也不敢这样随意对学界权威加以评论了。

张先生每周给我们讲两次课（共4学时），又增加一下午为学生答疑辅导。由于我们知识贫乏，辅导时提不出问题，所以某些同学干脆不去，或是参加一两次就不再来了。经常参加辅导课的只有三四人，除个别对先秦史有特殊爱好的同学外，我是每次必到的学生之一。我对辅导课如此热心，并非学习上有什么抱负，而是被他对学生的热情和渊博知识所吸引。初次见面，因为提不出问题，无话可说，他就设法打破沉默，一一询问我们是哪里人？待回答后，他就讲一些与此地有关的事，对每个同学的家乡及周围情况了如指掌。然后又问我们为何选择学历史？我们不约而同说是因为爱看旧小说。他就再问我们看过什么小说？大家也就来了兴致，有话可说，逐一道来。他也就逐一加以评述，不仅其熟稔之程度令人惊叹，而从中提出的问题更是我们闻所未闻。